

# 彭林： 一位虔诚的国学推动者

○ 学生记者 彭茜

彭林

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市，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，现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、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、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等；主编《中国经学》。



彭林长年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、尤其是儒家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的研究。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，著有《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》、《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》、《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》、《礼乐人生》、《中华传统礼仪概要》等；点校的经典与文献有《仪礼注疏》、《礼经释例》、《观堂集林》、《周礼注疏》等。

记者：中国近几年掀起一股“国学热”，有关国学的一些书籍也变得很畅销，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

彭林：我是一位虔诚的国学推动者，但我对目前的“国学热”很伤感，热是热，但感觉是虚热，就像感冒发烧，属于不正常的热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商业性质的国学班，这样的培训班打着复兴国学的旗号，把国学当作赢利的工具，一位学员要收两三万元学费。我很厌恶这样的班，它的理念和体系都是有问题的。

大学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“人格健全的科学人才”，可是不少大学把“人格健全”做成虚的，而把精力集中在“科学人才”上，怎能不出问题！以前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，最清高，不会犯低级错误，如今连大学校长、教授、博导都剽窃、造假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，他们的问题，折射出大学人格教育的严重缺失。目前在校大学生的人格问题同样堪忧。如果不痛下决心，彻底清理这块土壤，学术败类还会一茬又一茬地冒出来。

我一直在大学的第一线工作。我们这一代人是位卑未敢忘忧国，还懂得教师第一位的任务是“传道”，然后才是“授业、解惑”。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塑造民族精神，推动社会进步。我一直试图为提高大学生的人格走出一条路来，从课程设计到各个教学环节的安排，我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，已经积累了不少心得。我现在做的事情，正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但

我的声音非常微弱，只能影响教室里的几百人。我们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，我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，能够到我们的教室里来听听课，一起来讨论和研究，看看能否切实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。

记者：那对于国人的教育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方式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“热”？

彭林：首先需要解决对国学的认识问题。“文革”十年对传统文化的抨击，是以举国之力展开的，无论是谁，都被卷入到了这个政治漩涡中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负面影响。“文革”过去四十多年了，但是“文革”期间盛行的种种谬论，至今没有很好地清算。有些人甚至把它们当作政治遗产继承下来，至今还在“与传统作彻底的决裂”！认识问题不解决，其他问题就理不清。此外，最好、最快的办法是让国学进入主流教学的体制内。如今主流的教学体系对国学采取排斥、限制的态度，所以它只能在“体外循环”，这是很不正常的。让学生系统学习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，是天经地义的，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。

在应试教育的制度下，孩子学不到真东西，却弄得很辛苦。学校教育的样式应该是多样的、多元的。让家长有更多的选择，未必不是好事。

二三十年前，赵朴初、楚图南等十多位顶级学者联名上书，建议成立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式的国学学校，培养国学研究的专门人才。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建议。我们学电脑都知道要从娃娃



抓起，培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也知道要从三四岁的孩子抓起，培养能继承五千年文明的大师，难道不需要从娃娃抓起吗？我至今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样的学校至今办不起来。目前体制内的传统文化教育太薄弱，我看过新加坡的小学教材，三年级的课本里就有《韩非子》的选段了，而我们要到初中一年级才讲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也”，这句话要到初中才看得懂吗？这种状况家长会满意吗？目前有那么多的企业家、官员去上国学班，是因为他们在上学期间没有学过这些知识，今后要是在各级学校都能学到，而且都有正确的理解，如今的国学班还能火得起来吗？

记者：您觉得怎样提升大众在国学方面的素养？

彭林：要想提高自己的国学素养，就一定要主动去读经典，因为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。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它的经典。要想了解伊斯兰民族，就要读《古兰经》；要想了解西方文化，就要读《圣经》；要想了解中国文化，首先要读《四书》。中国人的价值观、行为方式、修身之道等都融会在《四书》里。书是要靠自己读的，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，热衷于一天到晚听讲座。我给他们讲《论语》，我说，我的课不过是引路而已，不能替代你们自己的学习。“文以载道”，经典上阐述的道理，是要用生命去体悟的，首先要去读，然后去品味和思索，然后再内化为你生命体的一部分。可以有意识地去背一些原典，背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你会感到终生受益。许许多多道理，大家都感觉到了，但却说不出来，而孔子、孟子用一两句话就把它说得很透彻，而且意蕴隽永，这就是经典的魅力。

记者：通过读这些原典可以有哪些收获？

彭林：严复说经典教育有两个基本命题：第一是人格，第二是国性。人格是要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。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，人的灵魂由上帝管束。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，人的灵魂是要自己来管的，所以特别强调人格的确立，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，一个够格的人。经典里谈的大多是做人的道理和原则，例如孝亲、仁爱、诚信、庄敬、中和、质朴等，是教你怎么做人。有学生问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：“能否以你的人生经历给我们些指点？”李嘉诚说：“先学做人，再学做事。”道理很浅近，但却是真理。中国人的人生路径是：做人、做君子、成圣成贤，经典可以给你许多的指导。“国性”，是指自己的国家属性，也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。你成天读柏拉图、苏格拉底，对于自己母国的经典却一无所知，你认同的不是中华文化，你就不配说自己是中国人。所以严复说：“无人格谓之非人，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，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。”中国人的人格和国性，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形成的，经典则是它的理论形态，你不读经典，怎么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，怎么可能有完善的人格呢？文化认同并不是盲目的，是在了解甚至熟悉它之后产生的文化自觉，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判断和选择。

记者：那么学习经典应采用怎样的方法？

彭林：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学习经典都讲究“知行合一”。首先是要求知，这就需要阅读，亲身接触经典，了解经典的文化精神。不少人对我说，经典很难懂，读不下去。我说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我们离清朝才一二百年，可是我们读清人的著作就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了。经典是用先秦的语汇写的，与我们相隔两千多年，谁都不可能第一遍就全部读懂，因此，最好先读读《说文解字》，了解先秦语汇的概况，再去读汉唐人写的注疏，就能看懂了。其次是笃行，就是学以致用，读经典是为了涵养德性，变化气质，提升自己的人格，而不是为了耍嘴皮子。“二程”（程颢、程颐）批评宋代的读书人：“今人不会读书，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荀子说，小人之学是“入乎耳，出乎口”，不往心里去，功夫做在口耳之间四寸大的地方，他们读经典是为了向别人炫耀。而君子之学是“入乎耳，着乎心，

布乎四体，形乎动静”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，完美自己的七尺之躯。《礼记》说：“君子不以辞尽人。故天下有道，则行有枝叶；天下无道，则辞有枝叶。”君子不在人前说尽好话，因为他们明白，如果天下有道，则每个人行为端正，犹如枝叶茂盛的大树；如果天下无道，则每个人光说不做，言辞之漂亮，也像枝叶茂盛的大树。我们应该做到行有枝叶，不要辞有枝叶，清华人的校风“行胜于言”，正是这个意思。“知行合一”，就是要把经典中阐发的美德在日常生活践行，“知”了不“行”，等于不知。知行合一才是真知。

记者：您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的交往？

彭林：中国文化自古就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壮大起来的，但是，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首先要有本位文化，这是内核。我们区分此民族与彼民族的依据，就是看他们的文化。到云南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傣、苗、彝等等的民族来，怎么知道的？他们的服饰、饮食方式、节庆都不同啊。文化是回答“你是谁”的问题，民族文化没有了，民族内部就失去了彼此认同的核心，必然成为一盘散沙，甚至走向消亡。历史上的契丹民族，尽管后裔还在，但是文化已经消失了。20世纪50年代审定全国有多少个民族，有人说他们是契丹族，但契丹文化是什么，他们一点也说不出来了。本位文化消失，民族随之消失。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，然后才有资格与其他文明对话。不能自己的轨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跟国际接轨，那是接到人家的轨上去了。近百年来，我们要么全盘西化，要么全盘苏化，自己的文化始终挺立不起来。所以，第一步我们要回归到自己的本位文化上，好好总结和发展，树立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，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。

记者：您怎样看待我国近两年来一直在推行的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战略？

彭林：如今的世界，信息交流非常频繁，这种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，强国利用信息优势影响弱国，左右他们的发展路径和方向，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附庸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。如今中国每天输入的信息与输出的信息相当悬殊，出现了严重的“逆差”，这一现象亟待扭转。但是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走出去？如今市面上流行的中

国文化是茶文化、酒文化、乞丐文化、青楼文化，拿这些东西走出去？举国上下，都在过圣诞节、愚人节、情人节、复活节，都在拿别人的文化冒充自己的文化了。西方人认为，他们的文化具有普世价值，因而应该主导全世界。其实，孔子以“大同世界”为理想社会、提倡仁爱，主张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等，同样具有普世价值，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它们推向世界。如果我们不能取得道德上的制高点，我们就永远不能抬起头来、挺起胸来，就只能是二三流的国家。

记者：有人说现在社会中的人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状态，并提出要构筑一个“国家哲学”，寻求一个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。您觉得这种“国家哲学”应包括哪些内容？

彭林：我不主张叫国家哲学，“哲学”这个词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。我在之前的文章提到，应有一个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“国家表述”。什么是中国文化？现在是各说各的，五花八门。中国文化是什么，应该有一种国家表述，无论问到哪个中国人，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表述。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基础。这个共同表述不是强迫的，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。我们到欧洲去，问到文艺复兴，每一个西方人都能给你一个比较一致的表述，而我们没有，说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还没有形成。西方人把宗教当信仰，而中国人把文化当信仰，因而文化的建设、理解、表述、传播，对于我们尤其重要。

记者：那对于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？

彭林：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思考“文化战略”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由于有正确的经济战略、政治战略、外交战略、军事战略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但在文化上尚未形成战略体系，现在是把它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。文化战略，一方面是对外的，中华民族以一个怎样的形象来面对世界，如何运用文化来作战略的或者战术的攻防；另一方面是对内的，如何运用文化来提升全民族的素质，以便适应新世纪的各种挑战。文化最根本的功用，就是用文教来“化”民，中国人一直在做的大文章就是化民成俗，这里面的空间很大，足以让我们发挥。如果我们不把文化放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，中国文化就很难被社会认识，遑论走向世界！